

现代出版： 理论与实务

第二辑

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科学研究中心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

第二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出版. 第二辑:理论与实务/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622-3149-4/G · 1550

I. 现… II. 华… III. 出版工作—文集 IV. G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033 号

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第二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董中锋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罗明波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00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ccnu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姜勇华

字数:180 千字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7.25

版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定价:12.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试论出版人的职业理想	范 军(1)
浅释出版人的敬业	沈东山(12)
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	谭家贵(19)
论出版职业精神与先进文化的内在协同性	董中锋(24)
论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精神	李 戎(35)
加强出版职业道德建设刍议	甘 英(46)
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职业道德解读	陈兰枝(52)
如何加强记者职业道德建设	
——从有偿新闻谈起	陈妮丽(57)
出版者的职业道德与职业利益	李 潇(65)
新闻出版的职业道德建设任重道远	喻 彬(70)
美术编辑人员的出版职业道德观	罗明波(76)
守住编辑道德底线	刘晓嘉(79)
编辑职业道德一二三	陈晓希(85)
社会转型期编辑职业道德失范现象透析	林 君(91)
编辑职业道德:立身立命之本	何军华(99)
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应处理好三大关系	龚华静(107)
矫正道德错位 强化道德建设	
——经济假新闻现象及防治对策	刘 华(114)



浅论图书编辑审美意识的建构·····	王文戈(123)
试论责任编辑的责任意识·····	龚琼芳(135)
论编辑的优化意识·····	冯会平(142)
陆费逵的出版职业道德观·····	凡 丁(146)
电子媒介、大众文化与出版使命 ·····	曾 巍(153)
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力求“两个效益”的最佳结合 ·····	方 玮(158)
职业精神一二三·····	黄本义(162)
塑造编辑主体健康心理的应对策略·····	王 炜(166)
图书出版业的扁平化营销·····	贺剑锋(170)
论数据库及其法律保护·····	段 维(178)
我国出版产业的现状、问题和变革 ·····	张 慧(192)
对出版集团规模问题的思考·····	赵 宏(199)
刍议协作(合作)出版·····	陈昌恒(210)
论校对模式的变迁·····	章光琼(215)
后记·····	编 者(223)

试论出版人的职业理想

范 军

职业道德大体上由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纪律、职业良心、职业荣誉和职业作风八个基本因素构成。而在这八个因素中，职业理想是最根本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所提倡的职业理想，主张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放眼社会利益，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职业理想，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灵魂。

思想决定行动。正因为职业理想的有无、高低，对职业态度、职业责任和职业良心等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职业行为、职业成就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或称“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就必须把树立远大的、正确的职业理想放在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编辑》的创刊号（2003年第1期）上，刘杲同志发表了《我们是中国编辑》的“代发刊词”。作者用诗化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抒发了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中国编辑，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荣誉，我们的责任。”“身为中国编辑，我们深知责任重大。振兴中华离不开出版，繁荣出



版离不开编辑。”“我们要求自己做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者。”“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女，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我们的最高利益。在我们心中，社会主义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是出版物所传播的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是人类智慧和知识的灿烂花朵，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里是对中国编辑的一种自觉的职业理想定位，其实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理想规范。原上海学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雷群明认为，“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因为他所从事的是“不朽的事业”（雷群明等著：《编辑修养十日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0 页）。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和职业理想定位，我们的出版工作就是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我们的出版人就会自觉做高尚而有道德的人，我们的出版事业就会呈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出版人的职业理想实际上是和他的出版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汪家熔先生在《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中说：“以前的出版史著作和论文，将古代出版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三类，后来也有人另添寺庙刻，成四类。我觉得，从其出版活动的目的来看，古代的四种刻书，实际只有两类：追求利润的出版和追求文化的出版。”出版的本质意义在文化的整合、积累与传播，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为文化而出版，而非为利润而出版。出版可以有利润，甚至是大利润，但它始终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是出版人的理想追求。当然，出版为了更好地、更持久地实现其文化目的，就必须寻求文化与经营的协调统一、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协调统一。

树立崇高、远大的职业理想，不仅应该成为出版人的一种自觉的追求，而且应该成为出版人的一种神圣的责任和使命。社会



主义出版工作者不能没有自己的正确的职业理想，这是由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我们的出版工作是党的重要宣传思想阵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总目标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舆论环境的重要职能，担负着深入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政治责任，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者，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如果没有崇高的职业理想和信念，而是一种实用主义、商业主义甚至是拜金主义的出版价值观，我们的出版工作就会出现不讲政治、格调低下、买卖书号、缺乏诚信、粗制滥造等问题，就会愧对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出版理想的缺位、崇高职业精神的迷失，必然导致出版市场的混乱和出版文化的失范。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这句话用到大学出版，乃至整个出版，我以为都是合适的。

二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理想教育，可以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光荣传统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也有必要吸取外国出版文化中有益的东西。

人们所熟悉的商务印书馆经历了百年的沧桑与辉煌。它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一个出版重镇，成为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可以与北京大学比肩而立的双子星座，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出版家们有着崇高远大的职业理想，并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曾经供职于清廷的张元济在参加戊



戊变法失败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寄希望于启迪民智,唤醒民众,提高民族的知识水平。陈原说“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是投身一项爱国事业。”(《读张元济年谱》,见《张元济年谱》卷端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因此,他办学、办报,最后投身出版,自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从事书业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在于他是从救国救民出发,体察到教育、文化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系。他曾说,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所谓“提撕”,是使人们觉醒的意思。有了这样的出版理想,才有了高水平的各类教科书,才有了对珍稀古籍的抢救与整理,才有了对先进的西学的选择和引进,才有了各种开风气的现代期刊。过去讲张元济是商务之魂,我们觉得只有具有远大理想和追求的人,才可能成为企业之魂。据有关史料可知,1904年以后,张元济是有机会重返政坛的。但他婉拒了一些政要的邀请,一直坚守出版,魂系出版。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叶宋曼瑛在《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2年版,张人凤、邹振环译,第6页,第292页,第297页)中认为:“张元济企图通过文化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他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家庭式印刷所改变成为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出版社”;“在成功地经营这家现代化企业的同时,张元济促进和推动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张元济是历史转折时期儒家学者最好的榜样。他实现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又发挥了高超的企业管理能力。他又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社会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丝毫没有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些评价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张元济的道德人格及职业理想。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杰出的出版家陆费逵(字伯鸿)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创出一片新天地,为祖国的文化出版事业作出重



大的贡献，也是与他献身书业的职业理想紧密相连的。他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也是中华书局在商业时代始终坚持多出书、出好书的根本缘由。

陆费逵的这段话，还让人想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评论出版时所说的：“此项工业为以智识供给人民，是为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智识，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的确，书刊的出版，书业的繁荣，与国家、社会进步关系甚密。

陆费逵先生在书业奋斗了一辈子，不幸于1941年病逝。在他逝世两周年时，著名编辑家、语文学家金兆梓在重庆发表《追忆陆费伯鸿》一文，很好地诠释了一个杰出出版家的职业理想。他说，中华书局“首创之者先生，扩大之者先生，中经蹉跌而复兴者亦先生”。他还认为，陆费逵办中华书局，目的是为了文化事业，为了教育事业，并非“图一己之私”，所以“一手经营资本数百万，员工数千人之大企业亘三十年之久，而身后所遗乃不如一寻常之商贾。当今之世，又得有几人”（见俞晓尧《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出版史研究》第6辑，第181页）。

出版史家汪家熔的《近代出版家的文化追求》一书，很好地描述和论说了职业理想在近代出版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进行职业理想教育的生动教材。比如他讲到最初以雄厚资金进军出版，与商务印书馆竞争的中国图书公司，之所以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就在于缺少一颗以文化为祖国作贡献的赤子之心（第168～169页）。他还讲到邹韬奋和沈知方这现代出版史上一正一反两个典型。邹韬奋我们就不说了。沈知方在19世纪末就被称为“书业奇才”。他曾在商务和中华两大书局供职，自己独立开办的



书局（出版社）不少于十个，结果是十起十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想以出版发财（第 170 页）。

关于出版人的职业理想，我们还可以从外国优秀出版家那里得到教益。三联书店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为书籍的一生》（三联书店 1963 年版）。这是一本回忆录，作者绥青是革命前俄国最著名的出版家。作为出版家，绥青的特点是：具有灵活的头脑和钻研的精神，敏感地注意到一切新鲜有益的事物。他非常地热爱书籍，勇往直前地追求目的，努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美化图书的装帧，拓宽图书的销路。而这一切都是缘于他把图书作为文化与进步的工具。高尔基说绥青“把五十年的光阴全部献给了这一件工作”，“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

英国出版家斯坦利·安文这样告诫出版界同仁：“如果赚钱是你的第一目标，你就别干出版这一行。出版业所付的报酬远非金钱所比。”他还说：“当代一位最杰出的作家说过：‘伟大的出版商就是一位文化部长，这个地位是没有政治家资质的人所无法企及的。’”（《出版概论》，书海出版社 1988 年版。）美国出版学家 J·P·德索尔也指出：“一个真正的出版者应该是这样的：既崇尚精神和艺术世界的价值，也注重经济学范畴的价值。”（《出版学概说》，姜乐英、杨杰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 页）事实上，崇尚精神文化价值的出版家和出版商，不以赚钱为主要目标的出版发行企业，在西方也是不少见的。奥地利一家只有四个人的青泉出版社的女经理韦格尔博士曾对中国书业界人士表示，一部手稿能否印成图书，关键的因素是它的市场前景，但图书又是精神产品，具有教育功能，因此不能单纯从商业角度出发，还得考虑社会需要。所以某些书尽管商业前景不乐观，但只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青泉出版社也坚持出版。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第一任理事长有井广己也曾提醒下属：“不要单纯追求畅销书，搞这种书即使经济效益上去了，可以快乐一时，却不是大学



出版社的本分。”这里道出了日本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理念，也暗含着日本大学出版人的出版理想与追求（罗紫初主编《比较发行学》第45～4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三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国与外国的事例都告诉我们，出版人职业理想的落脚点是自觉承担社会义务。一般说来，个人对职业的要求可以概括为职业的三要素：维持生活、发展个性和承担社会义务。这“三要素”在职业选择中，都有其合理性。而作为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人，在职业选择中应该把承担社会义务放在首位。现代杰出的出版家、出版史料专家张静庐在1938年出版的《我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中，坚持认为自己是“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说二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虽都以出版为手段，都要赚钱，但“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张静庐在该书的“写在后面”一节中这样说：“‘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得到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一切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朋友们——读者——也应该从上头去分析，去区别，然后会有最低限度的认识，而不会有超越限度的谴责。”正因为张静庐不是仅仅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所以阿英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充分肯定了他在新文化出版上的贡献，并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记张静庐。

张静庐的咬文嚼字的较真，使我们想到刘杲先生在为俞晓群《人书情未了》（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写的序中的一段话：“经



济再重要,毕竟只是出版的手段。文化建设才是出版的目的。出版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目的,不能没有经济的手段。出版的经济手段无论怎样强大,也不能失去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赚大钱、发大财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在出版中,经济与文化有机结合才有积极的价值。建国前的商务、中华,还有开明、文化生活等,是赚了钱的,像商务还是赚了大钱的,但他们经营书业的根本目的还是文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我们讲他们在出版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仍然是看其文化方面的创造与积累。

马克思讲,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自觉承担社会义务的职业理想,在作为编辑出版家的巴金那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曾说:“巴金以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事业方面的贡献,其实后者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前者重要。”巴金建国前曾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民出版社的总编辑。特别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期间,作为总编辑的巴金负责主编文艺方面的书籍。他先后主持出版了二十多种文学类丛书、专集,其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要数历时十年的大型“文学丛刊”(160种)。该丛刊的策划与出版,对于展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实绩,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这些丛书、专集,尤其是“文学丛刊”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巴金文学编辑家、出版家的地位。巴金自己说过:“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争取。”我们知道,巴金当了十四年总编辑,一直是“义务劳动”,没有要一分钱报酬。他把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民间岗位”,他在无怨无悔地履行自己的社会主义



务。巴金是文化出版战线的一名战士，他认为“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当代学人陈思和在为加籍华人作家余思牧的《作家巴金》写的序言中说，巴金“以名作家的地位，减少了个人性的文学创作，却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消耗在提携新进作家，维系文学新血，推动整个中国文学事业上面”，“他和他的朋友们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完全是为着一个理想，一股热血而义务奉献”。

像巴金这样热心出版，不计回报的出版家、编辑家，中国近现代还有不少。鲁迅一生喜欢编书、办刊，作为业余出版家、编辑家他在这个行当里奋斗了整整三十年，编辑过若干种刊物和报纸，办过七个出版社或兼有出版职能的社团。若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他基本上没有赚什么钱。有些项目、有些社团或书屋，一开始就是打算赔本的。人们今天讲他在编辑出版史上的辉煌业绩，往往是着眼于他对现代文学艺术（如引进外国进步文学，推进新文学的创作，如引进和倡导版画创作）的贡献，着眼于他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贡献。还有被学界称为科学编辑的杜亚泉，在进入商务之前的编辑生涯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不成功的，他最初搞出版钱赔完了，再回家卖房卖地继续干。但他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从事出版的目的是本质上就不是为了钱。

四

出版人的职业理想与时代、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职业理想的树立也当与时俱进。

不同时代的不同出版家，职业理想有着各自的时代印痕。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皆不尽相同。清代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张海鹏的看法是：“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为自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



区成就一己之学者,其道不更广邪?”(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四《朝议大夫张君行状》)张海鹏深感前人著作散失之遗憾,认为仅仅注意个人藏书,不努力加以传播,那些流传下来的珍贵古籍终不免遗失的命运。因此他刻书不是为图利,不是为利己,而是出于既要流布、保存古籍,又要嘉惠后学这两个崇高的目的。

当年,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则是为变革社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陈原先生说:“张设想的试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铺的机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大学校’。”而抗战时期主政商务的出版家王云五面对民族危亡、书业损毁,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宣布每日出版新书一种的计划,并复刊了《东方杂志》等数种期刊。这里反映出来的职业理想具有战时色彩,同样是难能可贵的。进步出版家邹韬奋的思想飞跃,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大飞跃。这个飞跃的特征是,告别了单纯的提高民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路,勇猛地同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理想主义升华了,书籍杂志成为新的启蒙运动的武器。它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武装读者的头脑,引导他们走向抗击侵略、变革社会的大道。可见,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出版家的职业理想往往各具特色。

今天,我们党确立了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理想也当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出版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我们新时代的职业出版人务必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是前无古人的。当然,不同的出版社在出版理想的表述上可以各有特色,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口号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商务印书馆的口号则是“分享学界历史光荣,建树中国未来文化”;而辽宁教育出版社则以“为建立一



个书香社会而奠基”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辽宁教育社的老总俞晓群在《梦系牛津》中在谈到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时说：“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一流的出版社能唤起你的一种追求，它不仅是对形式的追求，也不仅是对市场的追求，而是对于文化品位甚至人生理念的一种提升。在经济热得烫人的时候，我相信在理智的中国人心底一定喊着同一个声音：文化，文化，还是文化！让我们用明智的选择填补时代的缺憾，用辛勤的劳作接续文明的断层。”（见《人书情未了》，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这充满深情的话语，表达的正是一个出版人的崇高的职业理想。

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曾经担任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著名出版家丁景唐有段格言：“信念是不灭的光源，照亮永生之路——我读书、写书和编书。”（见《上海出版人》之《永远不知疲倦的青春歌者——记丁景唐》，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的确，没有理想和信念就没有灵魂，没有理想和信念也就没有动力。而崇高的职业理想则是引领人们奋然前行的旗帜和号角。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出版家，正是因为胸怀崇高的职业理想，投身书业，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才做出了可歌可泣、垂范后世的功业。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者理当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按照《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所要求的，“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己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弘扬出版职业精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繁荣祖国文化出版事业，努力、努力再努力。

浅释出版人的敬业

沈东山

2004 年中国版协颁布了最新修订的《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这是我国深化出版改革、加强行业自律的一项重要举措。这一准则的第 5 条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可见，敬业是我国出版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的职业道德准则。关于敬业，宋代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朱熹的解释是：“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与此相似，认为：“敬业是指专心致力于学业或工作。”这种解释很简练，但不能涵盖职业道德准则中“敬业”的全部内容，按照笔者的理解，敬业是一种态度、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行为。

一、敬业是一种态度

罗曼·W·皮尔说得好：态度决定一切。如何开创幸福、富有、健康的人生，这取决于你的态度，态度是一切人生财富的心理根源。对职业人来说，干一行，爱一行，是一种态度；干一行，怨一行，也是一种态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仍然是一种态度。但只有热爱自己的工作，才会将自己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才会投入地去做，因此也才会获得成功。卡耐基说过：“除非喜爱自己所做的事，否则永远也无法成功。”不论从事哪项工